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重在落实

□ 陈如平

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针对学生健康问题就作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这一指示明确了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中心理与生理关系的价值排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从“健康第一”到“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表述的深化折射出党对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也体现在一系列教育政策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政策表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99年，学生健康主要被纳入学校卫生工作范畴，政策重心放在传染病防控、食堂卫生、课桌椅标准等硬件与生理层面。健康被视为“非教学事务”，由校医室或总务部门负责，与教育教学主线关联较弱。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17年，是以体育为切入点的健康促进阶段。2007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文件，政策开始将体育作为改善学生体质的主要抓手，明确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但这一时期健康仍主要被理解为“体质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虽被提及，却在基层实践中常被边缘化。第三阶段为2018年至今，是以理念为统领的系统性重构阶段。全国教育大会后，健康不再只是体育或卫生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被提升为统领教育全过程的核心价值。《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一系列文件，将体质健康、心理健康、视力健康、营养健康等纳入统一框架，标志着“大健康”教育观的正式确立。

从学校卫生工作到核心理念，这一话语转换至少包含三重政策意涵。其一，健康从后勤保障上升为育人目标。健康不再只是让学生“不生病、能上学”，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身心一元论取代了身心二元论，健康成为教育的本体性价值而非工具

性条件。其二，健康从部门责任扩展为全员责任。过去，健康教育由体育教师、校医、心理教师承担；现在，所有学科教师、班主任、行政管理人员都被纳入健康教育网络。这意味着学校组织结构的调整——健康教育不再是附加模块，而是嵌入所有教育活动的底层逻辑。其三，健康从学校事务升级为社会治理议题。家庭、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媒体、网络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协同体系，教育治理已从学校单兵突进转向全社会协同推进。

尽管政策演进方向明确，但在基层实践中，“健康第一”仍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一是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当前教育评价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话语中的“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与操作层面的“一育独大”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高考仍以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中，升学率仍保有隐性权重。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学校和教师面临“说一套做一套”的制度性压力：政策要求重视健康，但绩效考评奖励的核心是分数，这种张力在毕业年级尤为突出。一些地方的调研发现，初三、高三的体育课被挤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年级，课间活动被压缩为“上厕所+接水”的极简模式。学校并非不知健康的重要性，而是在现有评价框架下，健康教育的收益是长期、隐性、难以量化的，而学业训练的收益是短期、显性、直接关联升学结果的。二是空间资源的供给不足。以城区学校为例，22亩土地容纳近3000名学生的现象并不罕见。在物理空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课间15分钟让学生全部涌入操场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于是“走廊圈养”成了不少学校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空间不足的背后，是城市规划与教育用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新建学校往往选址在土地成本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生均占地面积达标，但服务半径过大；老城区学校地处核心地段，服务半径合理，但基本没有改扩建空间。这一矛盾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三是安全责任的无限泛化。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边界模糊，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学校往往要同时面对家长索赔、舆情压力、行政

追责等多重后果。学校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最保守的策略——压缩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将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家庭预期的功利惯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叠加校外培训治理后的“回流效应”，让不少家庭对学校健康教育举措抱着矛盾态度：一方面希望孩子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又担心“别人家孩子在补课，我家孩子在跳绳”。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家庭层面的健康支持严重不足——睡眠不足、屏幕时间过长、营养不均衡等问题，根源往往在家庭而非学校。

尽管面临上述结构性困境，近年来已有部分地方和学校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探索出了具备推广价值的实践经验。但从政策层面来看，落实“健康第一”理念不能寄希望于个别校长的情怀或个别学校的探索，它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评价制度指明方向，课程制度提供载体，空间制度夯实基础，安全制度做好保障，协同制度提供支撑。只有这些制度形成合力，“健康第一”才能从政策文本走入校园日常，从教育理念变为教育现实。

一是将学生健康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职评价体系，实行“硬挂钩”。国家层面应明确将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近视率、心理健康筛查异常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年度监测—通报约谈—限期整改”的闭环机制。通过“指挥棒”的刚性约束，推动地方政府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

二是深化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推动“学科渗透+数据驱动”。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快制定健康教育学科渗透指南，明确各学科在健康教育中的功能定位与教学内容。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生健康数据平台，实现体质监测、视力筛查、心理测评数据的自动归集与动态分析。要求学校每学期基于健康数据形成教学改进报告，将健康数据转化为调整教学的循证依据，避免“测而不用、用而不改”的问题。

三是完善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界定，为课间自由活动松绑。加快修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校方在学生意外伤害中的责任边界，区分

“管理失职”与正常活动意外。同时，推广校园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全覆盖，建立“保险先行赔付+责任事后认定”的快速处置机制。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双重保障，让学校管理者敢于“放开手”，让学生重新拥有可以自由奔跑的课间。

四是加大健康教育资源投入，重点补齐硬软件短板。硬件方面，建议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中，单列体育场地设施、心理辅导室、校医室的改造资金。软件方面，重点解决心理教师编制不足、体育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按照1:500的师生比尽快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将体育教师工作量核算标准与学科教师拉齐，消除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差异。

五是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健康支持网络。建议教育、卫健、体育、民政等部门联合出台校家社协同促进学生健康指导意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具体包括：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免费开放；医疗卫生机构与学校建立一对一健康服务关系；媒体平台减少“虎妈”“鸡娃”类叙事，增加科学育儿与健康教育内容的传播权重。通过多元主体同向发力，构建覆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全时空健康支持网络。

六是培育“健康第一”的学校文化，推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度之外，学校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将“健康第一”纳入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的核心模块，提升校长对健康教育的领导力。同时，鼓励学校通过健康班级、健康达人、运动嘉年华等载体，营造“运动光荣、健康可贵”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健康第一”的理念从墙上标语转化为师生共识，从外部要求转变为内在自觉。

健康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把“健康第一”作为教育的核心理念，不是降低对学业的要求，而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培养完整的人。当我们的孩子既有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又有扎实的学识、创新的思维，教育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知识获取方式与阅读行为习惯。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使知识检索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图书馆的地位受到明显挑战；同时，算法推荐裹挟着“机器幻觉”风险，使深度阅读面临被稀释的隐忧。然而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3253座公共图书馆全年总流通人次约14.7亿，比2024年增长1.3亿人次，“泡馆一天”“图书馆治愈”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这并非一时潮流，而是公众精神需求升级与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双向奔赴。

从“人找书”到“书找人”

人工智能的介入，要义不在于以机器替代馆员，而在于以技术延伸服务触角，实现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模式跃迁。

24小时AI馆员打破了时空限制。首都图书馆“图悦阅”、东华大学“东小图”等智能问答系统提供全天候咨询服务，让服务从“朝九晚五”延伸至“全年无休”。这实现了从“有限时间供给”到“无限时间可达”的范式转换，降低了使用图书馆的心理门槛。

个性化推荐系统重塑了读者与馆藏的连接方式。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推荐系统，综合分析读者借阅历史、浏览轨迹与兴趣标签，实现精准推送。设计精良的系统应是“谦逊的向导”——在捕捉偏好的同时有分寸地引入新知，激发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实现从“被动检索”到“主动发现”的转变。

智能流转系统则为读者节省时间成本。AGV机器人使图书自动分拣、搬运成为可能，部分馆已实现15分钟内送书到手。这降低了读者获取资源的“认知负荷”，使其更专注于知识吸收本身。

降低阅读门槛是AI的另一使命。AI翻译、智能查询可即时扫清语言障碍；生成书籍纲要和知识导图帮助建立宏观框架。但必须强调，这些工具旨在“辅助入门”而非“替代阅读”。AI存在“机器幻觉”，常编造虚假文献、传递偏见观点，国内外已出现因盲信AI导致的学术不端案例。图书馆在引入AI辅助的同时，更需承担信息素养教育职责，引导读者保持批判性思维，使技术成为攀登知识高峰的阶梯，而非引向歧途的伪装。

沉浸体验让书“活”起来

在AI时代，图书馆空间正从单一文献存储场所，拓展为融知识获取、文化感知、审美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场域。

与历史名人对话赋予空间全新想象力。利用数字人技术复现鲁迅、苏轼等历史人物，搭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机制。经典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亲近的鲜活存在，文化传承在代入感中自然发生。这打破了传统阅读中读者与文本的单向关系，构建了“读者—媒介—经典”的三元互动结构。

AIGC技术将古籍转化为动画、影像乃至互动游戏。福建省图书馆围绕《藏涯胜览》开发“藏涯奇航”手游，将古籍主题设计为解谜探索游戏，读者在参与中进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图景；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借助AI实现14万余册古籍文本翻译、自动句读，上线不到一年访问量突破千万。这种转化不是对古籍原貌的背离，而是在核心语义不变前提下的当代转译，以熟悉媒介重建与历史文化的连接。

拓展服务边界彰显对多元需求的关照。AI眼镜智能讲解、AI自习室等创新，使图书馆从“阅读空间”走向“学习与成长空间”。但技术介入应以“不打扰”为原则，守护那份珍贵宁静，为不同需求读者提供差异化场景支持的弹性空间。

强化情感联结让书“暖”起来

技术的加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而非让人从真实文化体验中抽离。图书馆的魅力终究来自它作为“人的空间”的独特气质——那份不设门槛的包容、那种带着体温的服务、那些面对面的真诚交流。对特殊群体的关照是人文温度的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读者爱上图书馆

□ 刘海英

标尺。面向老年读者的大字版界面、语音交互等适老化设计，让数字红利不被年龄阻挡；首都图书馆“天使眼”智能阅读器通过文字识别与语音合成，帮助视障读者“听见”文字。这些应用的核心不是追求效率，而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有阅读意愿的人，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能享受阅读的快乐与尊严，这体现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公共服务功能。

强化情感联结是AI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再精妙的推荐系统，也无法替代馆员递来一本好书的温暖；再逼真的数字人，也无法复制读书会上思想碰撞的真实温度。读书会、文化沙龙、真人图书馆等社群活动，将图书馆从资源供给者升华为文化连接者，让个体阅读升华为群体精神共建。这些活动构建的是“桥接型社会资本”——打破圈层壁垒，促进不同背景读者间的文化交流，而这恰恰是算法推荐难以实现的。

AI时代图书馆的魅力，不在于技术有多炫酷，而在于用科技延伸阅读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依然守护那份宁静、关怀与情感联结。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是桥梁，而非屏障。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社会效应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导向。当技术置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知识公平获取的价值坐标中时，它便成为连接读者与知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群的桥梁。面向未来，还需正视基层图书馆困境，推动优质资源和AI工具向基层下沉，通过馆际协作、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帮助经费拮据、人才匮乏的基层馆实现数字化转型。唯有技术进步红利覆盖城乡，“让读者爱上图书馆”才不只是一句口号。



（上接1版）

坚持以为政治建设统领深化党性教育。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党性教育始终把政治修养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校把政治训练和政治历练作为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推动党员、干部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政治品格、积累政治经验、增强政治敏锐性。经过持续努力，全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明显提升，践行“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坚定。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把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贯穿始终，才能确保教育不偏向。

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同向发力。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施行一系列与党性锻炼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使党性教育的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党性教育在制度轨道上规范运行。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党性教育才能既触及灵魂，又管住长远。

坚持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集中性教育解决突出问题，经常性教育巩固教育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9次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教育，每一次都明确提出增强党性、加强党性锻炼方面的

要求，党内集中教育与集中性党性教育相互关联、协同推进。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作用，将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与深入推进党性教育紧密结合，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把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党性教育才能既有集中发力、解决突出问题的效果，又有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韧性。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三者是有机整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方略，就是将党性教育同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贯通起来，解决作风问题要从党性上找根源，增强纪律意识要通过增强党性强根基。特别是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党认真学习党纪国明纪守纪，以严肃严格的纪律教育锤炼坚强党性，通过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高度自觉，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只有与正风肃纪反腐紧密衔接，才能形成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管党治党合力。

这些成就和经验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性教育的战略价值，在于全党上下形成了抓党性教育不松劲、不歇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这些经验也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

新征程上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着力点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党性教

育是一项长期工程，贵在坚持，重在实效。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必须在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上持续用力，着力克服“一阵风”“走过场”等倾向。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进一步健全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日常性经常性党性锻炼制度体系，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过程中检验和增强党性，在密切联系群众过程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加强党性锻炼，在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坚定党性自觉，在严明党的纪律过程中不断增强党性教育实效性。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防止教育热一阵冷一阵。

坚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党性教育能否持之以恒推进和加强，关键在于加强党性教育的政治责任能否持之以恒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性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筹推进、党校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具体实施的协同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既带头接受教育，又亲自谋划推进，防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以刚性责任确保党性教育不断线、不掉档。

坚持问题导向、学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性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紧密联系 actual。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和岗位特点，差异化设置教育内容。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